

西方现代派文学 与《圣经》

孙彩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现代派文学 与《圣经》

孙彩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孙彩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8

ISBN 7-5004-5105-9

I. 西… II. 孙… III. ①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②圣经—宗教文学—文学研究 IV. I109. 9②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039 号

特约编辑 段福德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张选令 蒋海军
封面设计 河东河西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传 真 010-8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金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基金
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别开生面的西方 现代派名作解读

孙景尧

孙彩霞君的新作《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外国文学研究著作。它在解读西方现代派七大家卡夫卡、艾略特、叶芝、马尔克斯、波德莱尔、贝克特和加缪的代表作时，一改国内通常的纯文学性阐释路径，而改从《圣经》与文本关系着手，有根有据地作了影响踪迹的梳理与转化创作的阐述，成为一本既有学术功力又有理性趣味的著述。全书的文字流畅，分析细腻，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获得了一次文学魅力与思想浪底映相交辉的美的欣赏。感谢作者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作者给了我一次开卷有益的读书乐趣。

我与作者既无师生关系，也非沾亲带故。除了都姓孙，如俗话所说，也许五百年前是一家之外，就毫无瓜葛了。我与彩霞的相识，完全是个偶然。三年前，在开封举行了国内第一次圣经阐释与中国文学关系研讨会，这也是第一次有文学界和神学界双方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会议。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学生。因为她的谦逊与腼腆、好学与热情、执着与多思，使我一下子又恍如回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校园，又见到了那批风华正茂、积极上进的莘莘学子。后来她在会议上宣读其论文，我记得是谈卡夫卡的宗教关怀问题，我颇觉意外。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清楚知道了她的教师身份，而主要是她的学识功底和个人创见吸引了我。毋庸讳言，在圣经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也包括那次会议，都存在两种并不和谐的情况，即明显存在神学解读的“唯信称义”的预设标准，以及文学解读的文学性或叫美学性的预设标准这两大差别。这在有关《圣经》文本的讨论时，尤为显著。会上个别虔诚信教的代表，谈起《圣经》文本，哪怕是俗世故事，也总成为一次布道弥撒，并全然不顾旁人的意见和起码的学术规范。这使我不由反思起，四个世纪之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中欧思想文化冲突。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都各自以自己传统的思想资源为准，来看待对方所表述的话语。因此，这一场貌似“对话”、实为各自“独白”的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双方都以各自的预设标准，去作“证伪”而非“证实”。于是中方的反教派要“破邪”“辟邪”，而西方传教士则是“补儒”“超儒”，未能作真正的求实求真的对话与沟通。彩霞的发言，恰恰就在这点上有所突破，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没有扎实的基督教和外国文学两门学科的专业功底，没有严格到位的学术规范训练，没有自己艰苦善思的深究，没有将圣经文本和文学范作都视为“教典”、“文典”、“史典”等综合多元“经典”的开放性视野，是不可能做出像样的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论文的。她的这篇论文，后来收入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圣经与文学阐释》论文集。而后一点，即综合多元的开放性视野，在眼前的这本新著中，有了新的发挥和彰扬。

众所周知，《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诚如已故教授杨周翰先生所说：“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十七世纪英国文

学》，北大出版社，1985年）其本身就是西方文学文化的源头和传统。“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至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西方文学和基督教论文集·圣经与西方文学》，北大出版社，1996年）因此，在传统的西方文学中，我们可以从其中世纪的教会文学中，从那些不胜其数的圣经故事、圣徒传记、梦幻奇迹、宗教剧，甚至欧洲的民族史诗和骑士文学中，一眼看出其中《圣经》教义的说教和演绎，无处不在。诚如温沙特和布鲁克斯所说：“世界的广阔无垠和细如秋毫均为上帝光辉之象征。”（《文学批评简史·结语》，纽约，1965年）即便是反神权、反中世纪神学的文艺复兴及其之后的启蒙运动、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文学作品中，仍然不难发现，《圣经》的影响还时隐时现、或正或负地存在于文学之中。从但丁《神曲》的三界之分和赏罚等级，到莎士比亚剧本中对《圣经》言语的一再引用，再到“伟大老人”歌德《浮士德》中名异实同的魔鬼，直至19世纪拜伦的《该隐》、雪莱的《撒旦挣脱了锁链》、维尼的《摩西》等，都是十分明显的。而更多的则是自然而然并正负皆有地融入于文学作品之中。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等，正如艾略特所说：“人文主义是时隐时显的，而基督教却是延续不断的。”（《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其实，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张扬本身，就是同《圣经》中将人定位为万物灵长的观念难脱干系。在《圣经》开宗明义的“创世记”中，天主创世忙碌六天之后，就将其所创造的世上万物，都交由人来治理使用，并对此安排十分满意：“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就此而言，西方时隐时现的人文主义，就是同延续不断

的基督教及其《圣经》，共存相生为其一脉相承之传统。

但问题是，20世纪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是以“反传统”而著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一书，一方是“反传统”，另一方是“传统经典”，看来是南辕北辙的双方，它们之间又是怎样“延续不断”为现代派的呢？对此，并非无人研究，也并非没有著述。西方学界自然是著述林总，而国内近年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孙彩霞这本新著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上述基础上，经过自己对《圣经》和七大家文本的细读细析，相当有说服力的作了具体细致又条分缕析的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比较研究，从而形象而又理性的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运用了国内外学者卢曼等对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研究的观点，即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有社会和思想两大层面。在当今西方现代社会中，其宗教组织及其表现活动，已从传统的中心位置退居边缘，出现了宗教与社会、宗教系统自身和宗教价值语义都分化的三大趋势。因而，充满异化的西方现代社会，其“孤寂”的现代人，越是同历史和未来间隔、越是同他人间隔、越是同其处境与存在间隔，也就越是要从其传统宗教的另一层面，即基督教信仰在神学、哲学、文学和艺术中的思想性表述，去呼唤传统基督教精神的复归，去重建西方传统文明那不异化、不孤寂的“复乐园”。这就合乎逻辑地解答了反传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传统经典的圣经文本之间的关系，将基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现代派文学，同基于非理性信仰体系化表述的《圣经》，既从学理上揭示了如伽德默尔所说：“在书写形式里，一切记载下来的东西都是同现在共时并存的……过去与现在就有一种独特的共存”（《真理与方法》，纽约，1989年）的规律，又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反传统的现代派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及其本身就是其传统演变与发展的结果。对此，从第一章的波德莱尔《恶之花》的主题

与《圣经》的神学宇宙观的比较分析中，就引导读者去发现“天使醒了，在沉睡的野兽身上”；直到最后一章，通过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罪与罚的解读，还是告诉读者，这是变异重构的“从乐园到巴比伦”的《圣经》式的叙述模式。读后可清晰发现，全书重点分析阐释的是，七位现代派作家作品对圣经原型的移植及其教义的化用。从而也会认同作者的见解：现代派文学乃是与《圣经》的深层精神有着潜隐联系特质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不仅对广大读者，就是对我们高校师生全面客观地认识现代派文学，显然都是开卷有益的。

作者在“导言”中坦率告诉读者，自己“学术水平”是有限的，并承认书中有些“遗漏与谬误”，是自己“无力避免”的。但我知道，作者参加撰写过《基督教文学》、《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等多部著作，也发表了多篇论文。在人数本就不多、论著远非丰硕的文学与宗教关系学界中，以其三十出头的年纪和上述骄人的成绩，本也可以有些许自喜，或写上一些只有己知而他人难懂的治学之苦、之累、之难、之怨……等抒情感叹。但作者彩霞却并非如此，依然是甘于淡泊、甘于寂寞的平常心态，依然是学而知不足的谦逊和腼腆，依然是当初我认识她的那个莘莘学子的样子。我是很愿意同她、同具备严于律己的学术道德操守的年轻朋友，结为学友同窗并求知求真的。

2005年1月—3月写于上海西南和贵州黔西南

目 录

导 言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	(1)
1. 根脉	
——《圣经》与西方文化	(3)
2. 反叛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化特质	(13)
3. 潜隐	
——《圣经》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	(20)
第一章 波德莱尔	(26)
1. “天使醒了，在沉睡的野兽身上。”	
——《恶之花》的主题与《圣经》的神学宇宙观	(29)
第二章 叶芝	(52)
1. “世界的创造和统治者”	
——《印度人论上帝》与《圣经》的上帝观	(55)
2. “在那里国王不过像乞丐一样”	
——《奔向乐园》中的神召与得救	(62)
3. “无疑基督就要重临”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

——《基督重临》与《圣经》的末世论神学 (68)
4. “婚床带来绝望，爱情使世界窄如池塘。”	
——“所罗门”诗二首与《圣经》的女性观 (77)
5. “从圣火中走出来吧，成为教我灵魂歌唱的导师。”	
——《驰向拜占庭》与《圣经》的人性观 (86)
6. “他们所说的一切是吠儿得喽儿得咯哩噢”	
——《朝圣者》中的宗教与语言 (96)
第三章 艾略特 (103)
1. 我不是施洗约翰，也不是复活的拉撒路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解析 (108)
2. “干旱的月份里，等待着雨。”	
——《小老头》与《圣经》的拯救主题 (122)
3. “在死去的土地里”	
——《荒原》与耶稣的死而复生 (134)
4. “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	
——《圣灰星期三》中的忏悔与皈依 (167)
5. 艰难的旅行，心灵的重生	
——《三圣人的旅程》解析 (189)
6. 肉身的生命死去，属灵的生命长存	
——《西蒙之歌》与《圣经》的生命观 (195)
第四章 卡夫卡 (203)
1. 最后审判的寓言	
——《在流放地》与基督教的末世论神学 (208)
2. 宗教精神的失落与重构	
——《乡村医生》中的先知原型 (222)

目 录

3. 和上帝的疏离	
——《我和农民的谈话》与摩西之约	(231)
第五章 加缪	(242)
1. “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	
——《鼠疫》中的神学与理智主义	(244)
2. “重新开始，重建慈悲之城。”	
——《叛教者》与《圣经》中的偶像崇拜	(260)
3. 在沙漠里想像着棕榈的海洋	
——《不贞的妻子》中的罪与拯救	(273)
4. “基督没有在阿尔及利亚登陆”	
——《第一个人》中的基督教思想	(281)
第六章 贝克特	(295)
1.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等待戈多》中的寻父主题	(297)
第七章 马尔克斯	(320)
1. 从乐园到巴比伦	
——《百年孤独》中的罪与罚	(323)
后 记	(359)

导言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混乱的世纪，垄断经济和科技革命合力冲击着传统观念，惨烈的战争、丑恶的屠戮更使现代人陷入极其沉重的悲哀，人们一度丧失了信仰的热情。根源于这一特定文化氛围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包含着内在的悲剧性，处处流露着对理性的迷惘、对上帝的怀疑和对人类的灰心。然而，20世纪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和动摇只是其宗教外壳的松动，其精神内核仍然以哲学、信仰和文学的形式得以留存。

上帝的缺席使世界黑暗弥漫，人类的生存如临绝望的深渊。在希望渺茫的时代，人们执著地“等待戈多”，尽管“戈多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由于基督教信仰早已深深植入西方社会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之中，它是西方人一切生活的基本方式，因此这种“等待”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回归，不如说人们从未远离上帝。短暂的动摇使人们开始走向真正的成熟，这时的基督教已从宗教型向文化型靠拢，从外在向内在深化，从单纯的信仰转向一种心灵领悟引导人们关注生命本体。它所包含的两个层面，即神性的终极关怀和世俗的人文关怀既为人们提供了支撑其存在的信念和希望，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

又指导他们积极思考当下的生存状态。与此形成对应，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在对信仰的背离、反思与回归中体现着这一剧烈转变，现代派文学对以“上帝”为象征的终极意义的探求是迷惘后的理性自觉，是在新的层次上对生存意义的追索。可以说，在基督教的角色转换中，西方现代派文学既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参与了反传统（包括反宗教）的文化思潮，又作为基督教精神继承的载体之一反映了基督教精神内涵的转变。

1

根 脉

——《圣经》与西方文化

19世纪的牛津大学教授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对比了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他大力肯定希伯来传统在社会道德规范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却批判其中的绝对服从、不假思索地追随上帝、克制和奉献自我等教义。与之相比，阿诺德认为，希腊精神代表着善于思考和追求知识的传统，能给予社会以“理智的光照”，因此他赞同希腊精神的自由和快乐，提倡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但他也看到文艺复兴的另一面，即太多的思想自由、无拘束的满足欲望容易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他写道：“如果说伟大的基督教运动是希伯来精神和道德冲动的胜利，那么被称作‘文艺复兴’的那场伟大运动就是智性冲动和希腊精神的再度崛起和复位。……但如同古代多神教世界的希腊风气一样，文艺复兴在道德上也是孱弱的，道德品格松垮，道德感情冷漠。”^①

回溯西方文化的根脉，人们发现，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是全部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的源头，它们的冲撞、融合和此消彼长左右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也促成了西方文学摆锤状的精神发展线索。

^①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0～121页。

60 多年前，朱维之先生在《基督教与文学》中就曾指出：“欧美文学向以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为渊源。希伯来文学思潮在欧洲文学国土中至少要占有半壁江山。希腊文学以荷马史诗和沙弗克尔等底悲剧为主；希伯来文学则以圣经为惟一的代表作品。所以圣经和希腊史诗，悲剧，同为欧美文学底源泉，好像国风和离骚为中国文学底源泉一样。后代文学都取汲于它而得滋生化养。”^①

在这两大源头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更为持续和深入。所以，艾略特说：“人文主义是时隐时现的，而基督教却是延续不断的。我们不必去设想，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欧洲各民族的发展可能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不必设想一个相等于事实上存在的基督教传统的幻想的人文主义传统。”^② 可见，要真正研究西方文学史，就必须对其与《圣经》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谢大卫强调说：“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至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③

暂且撇开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将研究重点放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方面，我们发现基督教文化在欧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西方文学也随之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转变。

一 初成体系

公元前后，希伯来—犹太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结合而

①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0 页。

② T. S.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6 页。

③ 谢大卫：《圣经与西方文学》，收入《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为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诞生之初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即“皇帝和加利利人”的斗争。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合法并定其为国教，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取得初步胜利。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守旧的罗马贵族归罪于罗马人对基督教的皈依。为驳斥这一指责，拉丁教父奥古斯丁于413至426年著成《上帝之城》，通过比较“上帝之城”和“世人之城”论述其系统神学和历史哲学。所谓“上帝之城”，指天国乐土；所谓“世人之城”，指人世社会及世俗国家。世人之城短暂而不完善，上帝之城永恒且无瑕疵。两座城由两种爱造成，世人之城出于爱己之爱，上帝之城起于爱神之爱。两城看似混杂难辨，然其结局迥然不同，世人之城终将走向灭亡，上帝之城终将取而代之。奥古斯丁鼓励人们，放弃尘世追求，立意灵性超越，以求为上帝拣选，进入上帝之城。此书系统阐释了原罪、堕落、预定、拣选等主题，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哲学，奠定了教会外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他的另一著作是《忏悔录》，“忏悔”意谓“信仰表白”、“颂扬上帝”，全书共13卷，1~9卷记述作者本人前半生思想变化的过程，10~13卷主要对《圣经》，特别是《创世记》做出注释和阐述。

这是基督教思想初成体系的时期，也是从民族性的犹太教异端教派转变为世界性的宗教迈出的第一步。

二 全面胜利

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灭亡，古希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日耳曼民族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之融合而成中世纪文化，基督教逐渐取得全面胜利。这一转折时期的著名神学著作是鲍埃蒂的《哲学的慰藉》，此书讨论了人世的罪恶与上帝的公义、上帝